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编

# 文化决策参考 (2013)

The Refer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s Decision  
Making (2013)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文化决策参考

## ( 2013 )

The Reference of  
Cultural Development's Decision  
Making ( 2013 )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决策参考. 2013/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编.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  
ISBN 978-7-5097-6200-4

I. ①文… II. ①首… III. ①文化事业-发展-研究-  
北京市-2013 IV. ①G12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1788 号

## 文化决策参考 (2013)

编 者 /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出版人 / 谢寿光

出版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人文分社 (010) 59367215

责任编辑 / 吴 超

电子信箱 / renwen@ssap.cn

责任校对 / 白 云

项目统筹 / 宋月华 吴 超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印 张 / 19.25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字 数 / 285 千字

版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6200-4

定 价 / 69.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前　　言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于 2012 年 2 月建院，其自我定位是兼具学术型思想库与研究型智库双重身份的高端科研机构；其办院宗旨是“学术本位，公共关怀，首都意识，全球视野”。文化研究院的内部刊物《文化决策参考》作为研究院的主要机关刊物，其编辑方针充分反映了文化研究院的这一自我定位和办院宗旨。刊物从文化研究院建院伊始即开始编辑出版，到现在已经出版 21 期。该刊以专题研究论文或调研报告的形式，从顶层设计的高度研究国家和北京文化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与实践议题，为市委、市政府的文化决策提供学术支持。刊物直接上报市委、市政府和其他管理部门，有效实现了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言的转化。

2013 年度的《文化决策参考》秉持文化研究院的一贯宗旨，其选题与研究方法力求前沿性、实证性和前瞻性，并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征引和对个案的扎实分析，积极回应国家与北京文化发展的最新动态，密切关注高新技术条件下与转型社会语境中出现的最新文学艺术形态，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最新趋势保持一致。文章的具体内容涉及当下文化建设的各个重要方面，比如，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价值观建构、文化产业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公共文化服务等。

为了让《文化决策参考》上发表的文章能被更多的读者看到，更好地发挥其社会影响，我们按照惯例以图书形式编辑出版《文化决策

参考（2013）》，期待得到同行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回应和批评。同时，我们也诚挚地希望大家继续关心《文化决策参考》今后的编辑出版，踊跃投稿，为繁荣首都文化事业共同努力。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2014年5月14日

## — 目 录 —

忠于职守：亟待建构的行政文化 .....	刘新成 / 1
发展文化需要正确认识政府作用 .....	陶东风 / 6
大都市轴心化：生态之厄 .....	高小康 / 14
城市的政治化与城市体制改革 .....	郑永年 / 25
要素与指标：世界上建设国际化中心城市的 new 趋势 .....	金元浦 / 38
“微生活”新论 .....	张颐武 / 46
“微文化”：基于互联网革命的新文化 .....	李极冰 / 50
微信之争的三重效应 .....	孙佳山 / 62
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十年回顾与攻坚策论 .....	孔建华 / 71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实施情况评估报告 .....	孙 博 / 82
借力整体性文化创新 建立文化管理新机制 .....	高宏存 / 94
文艺演出院线：以市场的力量深化文化体制改革 ——加快推进我国文艺演出院线建设的若干思考 .....	孙凤毅 / 101
大力发挥出版业在国家文化中心建设中的战略引擎作用 .....	何 奎 / 110
北京文化走出去亟须确立“全球细分战略” .....	盖 琪 / 117
“转到幕后看问题” ——冯小宁导演专访 .....	盖 琪 / 127

## 找准文化政策定位，构建特色城市文化

- 公共文化服务的香港经验 ..... 蒋 璐 / 138  
文化产业：新型城镇化的动力源 ..... 范 周 / 147  
2013 中国文化产业指数报告 ..... 胡惠林 王 靖 付 璞 / 156  
文化创意产业“北京模式”与“昆士兰模式”比较研究

- ..... 李庆本 王 曜 陈小龙 / 165  
中国艺术市场诚信估价体系的建立

- 我们需要 AAC 吗？ ..... 宁 强 / 176  
二十年来中国拍卖市场的症结与突破 ..... 刘金库 / 183  
全球艺术品市场与金融：“中国机会”在哪里？ ..... 宁 强 / 190  
中国艺术品投资基金的 SWOT 分析及对策研究 ..... 张 萍 / 200  
当代中国内地艺术市场从业人员构成状况分析

- 以京沪两地艺术品经营机构创办人、高层管理  
人员为中心 ..... 吴明媚 卢 展 / 213  
北京高校文化创意产业人才培养的问题与思考 ..... 瞿晓雯 / 222  
关于北京市建设中国文化体验馆的建议与构想

- 以纸文化馆为具体案例 ..... 高秀芹 / 234  
对北京地铁文化建设的几点思考 ..... 安小兰 包晓光 / 243  
对北京胡同文化资源开发状况的调研及对策思考

- ..... 李 艳 马晓雪 李嗣茉 刘佳颖 / 252  
传承人开办家庭博物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

- 及其设计策略 ..... 李 艳 / 263  
文化自觉与正当性确认：当代中国“非遗”保护的权益公正

- 问题 ..... 耿 波 / 270  
重视有线广播在谣言应对及危机管理中的作用 ..... 郭小安 / 28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原则、载体与路径研究 ..... 范玉刚 / 291

# 忠于职守：亟待建构的行政文化

刘新成\*

中共中央日前发布《关于在全党深入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的意见》，指出活动“重点是针对作风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关于解决对策，现在大家议论较多的是建章立制。制度建设固然不可或缺，但在制度建设之外是否还应考虑行政文化建设？德国学者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出版一个世纪以来，一直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原因就在于作者指出，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有序运行，依靠的不是章程，而是文化。文化建设之重要，由此可知。

韦伯所说的文化系指行业文化，即该行业从业人员的潜在共识以及建立在该共识基础之上的行为方式。行业文化作为一种作风导向，对从业人员构成了既有别于制度他律，又不同于道德自律的特殊约束力。如果将领导干部视为一个特殊的行业群体，那么这个行业的文化就是行政文化。行政文化内容丰富，本文着眼点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即忠于职守。

忠于职守包括两个要义，其一是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其二是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说起来简单，要求也并不高，但真正做到并不容易，特别是在今天，很有大力提倡的必要。

把该做的事情做到位，首先需要思想认识到位，明确何为“职

---

\* 刘新成，民进中央副主席，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院长。

守”，为何“忠于”。所谓“职守”，乃是“职位”“职务”“职权”“职责”四者合一，也即不仅是一个工作岗位，还有在这个岗位上应当完成的工作任务和被赋予的权力以及应当承担的相关责任。现在一些干部热衷于当官，其实热衷的只是那个“职位”，只是职位带来的权力、荣耀和利益，而忽略了在这个职位上应当完成的工作任务和应当承担的责任。热衷前两者而忽略后两者，这是他们不能做到“忠于职守”的根本原因。

明确了“何为职守”，还要明确为何“忠于”。是谁设立了这些领导岗位，让干部们能够享受工作岗位带来的功名利禄？是谁赋予领导干部权力，让他们能够令行禁止、言出法随？不言而喻，都是人民。封建时代常常出现的“父母官”一词其实是过时、错位的概念，不是当官者“为民父母”，而是人民才是各级领导干部的“衣食父母”，是人民用辛勤劳动供养干部，是人民赋予干部们领导权力。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用出色的工作，用为人民排忧解难、谋取福利来报答人民，必须尽职尽责地把工作做好、做到位，让人民满意。这样才能对得起人民对领导干部的厚待和信任，这也就是“忠于”的原因。

领导职位越高，工作任务越繁重，手中权力越大，承担的责任也就越重大。一个决策、一项措施甚至一句话，就可能决定对某个人的生杀予夺，也可能决定某城市的“拆迁改造”和庄稼的收成；可能影响社会的兴衰治乱，也可能影响历史的进步或倒退。认识到工作的艰巨和责任的重大，对每个领导干部来说，怎能不夙兴夜寐、孜孜矻矻地对待各项工作，怎能不小心谨慎、严肃惕厉地使用手中的权力？人非圣贤，不可能完全不犯错误，但是我们应该要求自己尽量不犯错误、少犯错误，因为每个错误都会给国家、给人民造成损失和伤害，都会给民族的复兴、社会的发展、历史的进步造成无可挽回的影响。所以每个领导干部都要时刻绷紧神经，告诫自己不能玩忽职守，否则就会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犯罪。

思想认识到位之后，“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位”自然就成为“忠于职守”的应有之义。然而在现实中，“做好做到位”何其难也！当年林语堂和鲁迅都曾指出，“差不多”主义乃是中国最大的陋习之一，

这种陋习至今仍存。这次运动重点整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其突出表现就包括凡事不认真，不求甚解，不以为意，对工作推诿扯皮，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如果说，在农业社会或粗放式工业化时代这种作风的危害还不十分明显的话，那么在生产与管理均已智能化、信息化和高速化的今天则会造成极大恶果。做事不到位、“只求做不求好”与玩忽职守没有区别。细查各种事故频发的原因，因工作不认真、不到位造成的恐非少数。对于“差不多”主义的危害性有个算式：设一项工作含五个前后相接的环节，若每个环节都做到 90%，表面看完成得“差不多”，甚至感觉成绩不错，但其实五个环节的工作效果就是 0.9 的 5 次方，等于 0.59049，实际成绩是不及格。真正忠于职守，就要每个环节都认认真真做到位，争取做到 100%，争取做到尽善尽美，而且在各环节交接时严格把关，如发现不到位决不放过。如能做到这样，我们的管理水平就会大大提高，各种事故就会大大减少。

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其难度绝不亚于把该做的事情做好做到位，但这同样是“忠于职守”的应有之义，而且在今天具有遏制腐败、抑制不正之风的特殊意义。

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首先要反对官场盛行的“唯上”之风。治理腐败和渎职行为，严惩固然必要，但更重要的是阻断；严惩施行于恶果产生之后，阻断则可避免其产生；两相比较，显然阻断才更符合“把权力关进笼子”的真谛。“阻断”应设置于权力运行过程当中。如果把权力运行系统之外的干预称为横向阻断，把权力运行系统内部的干预称为纵向阻断，那么从我国现状来看，横向阻断的设置一时难以完备，纵向阻断则尚可期待。所谓纵向阻断，其实就是在上下级之间有所制约。造成恶劣影响的腐败和渎职行为通常发生在各级领导干部身上，而他们这些行为，不可能完全“保密”或“隐蔽”到权力链条中各个环节都无法察觉的程度，任何一级干部渎职逾权甚至违法乱纪，只要与之有工作关系的上下级干部不是“视而不见”“得过且过”，这些行为就能够被阻止。

问题在于，上下级常常是“视而不见”的。其原因就在于“唯上之风”，这是实现纵向阻断的最大障碍。所以要建构优良的行政文化，

反对“唯上”必须先行。首先是要改变干部选拔机制不健全、不民主的现状，不能由上级领导的个人好恶决定干部的任免升降，否则，如何讨上级领导欢心就会成为下级的首要考虑，就会上级交办的事情无论对错好坏一律办，而上级也会把“听话”“能办事”甚至专门擅长办上级想办而不便办、不敢办的私事当成选用干部的标准。克服“唯上”之风，就是要提倡忠于职守而不是忠于上级，做好本职工作而不是仅仅做好上级交办的事情，让老百姓满意而不是仅仅让上级满意。作为上级，不能把“听话”“好使”能办事作为选用干部的标准，要广泛听取群众意见，考察干部工作成果要有历史的眼光和宽阔的气量，有时敢于向上级说“不”的干部可能恰恰是好干部。

不该做的事情坚决不做，还要反对“人情文化”和“乡愿”陋俗。很多干部工作努力认真，自身清正廉洁，却也犯了渎职、违纪的错误，究其原因，就是克服不了“人情文化”和“乡愿”陋俗。这些干部不是没有是非之心，也不是没有发现问题，甚至不是不想抵制，只是得不到心理的支撑和舆论的支持，担心这样做只会落得于事无补、于己有害的下场，于是睁一眼闭一眼，甚至顺水推舟，助纣为虐。“请托”作为国情的一部分，古已有之，于今为烈，无处不在。对于社会上的“请托”之风，短时间内恐难存杜绝之想；但是领导干部之间的请托、干部亲属的请托，即使不涉及腐败，也是以权谋私，制造和扩大社会的不公平和权力的不正义，影响极为不好，因此必须杜绝。在现实生活中，如果仅凭干部的个人操守来拒绝请托，难免招致“不近人情”“六亲不认”“不明事理”的骂名，使干部们陷于两难困境，稍不坚定便成为随波逐流的“乡愿”。然而如果让“忠于职守”成为为官的最高准则，不忠于职守便会令干部身败名裂，这样请托者自然会三思而行甚至望而却步，即使请托者仍不识相，被请托者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加以拒绝。如此一来，吃喝送礼等不正之风都可大为减少，有利于遏制腐败，杜绝徇私舞弊的职务犯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已经包含忠于职守的内容，但当下官场普遍存在的玩忽职守、亵渎职守的现象说明，“忠于职守”的意识并未真正树立起来。本文提出构建“忠于职守”的行政文化，就是

建议把“忠于职守”四个字鲜明地标举出来，作为解决干部作风问题的重要对策之一，列入国家公务员和各级干部的考核标准，要求干部把忠于祖国、忠于党、忠于人民的口号落实到忠于职守当中，通过不断宣传教育和树立典型，使“忠于职守”的理念深入人心，成为所有干部的行为准则，同时成为整个社会的共识和风气。粗率敷衍、渎职腐败等行为仅仅发生在个别干部身上，败坏的却是整个国家的形象，腐蚀的是国家权力。顾炎武说“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说的就是官员无行使公民失去对国家的信任。国家与所有社群共同体一样，都是“信任的制度化客体”，公民不信任国家，就会把信任转向家庭、朋友或利益小集团。古罗马史学家塔西陀说过：“权力得不到正确行使，久而久之，就会失去人们的信任，后来即使正确行使，也不被人们相信。”这种危险被称为“塔西陀陷阱”，值得我们的为政者警惕。国家失去公信力，是极为有害和可怕的。

# 发展文化需要正确认识政府作用

陶东风\*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要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开创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持续迸发、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人民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全面提高、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的新局面。”

这段话把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力视作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可谓抓住了文化发展的根本，同时还把增强文化创造力和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艺术民主联系起来，提供了增强文化创造力的具体途径。要深刻理解胡锦涛同志这段话的精神，我以为关键是要正确认识政府的角色和作用，调整国家与社会、社会与个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 一 文化的活力在社会，社会的活力在个体

著名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家葛兰西把“上层建筑”分为两个领域：

---

\* 陶东风，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首席专家。

一个是被称为“市民社会”（又称“私人领域”）的整个有机组织（学校、媒体、民间社团等），另一个则是“政治社会”或“国家”（军队、警察等国家机器）。葛兰西指出，文化属于市民社会领域，文化领导权是在市民社会领域形成和运作的。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的“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也认为，美国文化软实力的优势得益于其强大的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社会，并直言：“与美国相比，中国依旧缺乏帮助创造国家‘软实力’的非政府机构。”<sup>①</sup>

这些理论卓见启示我们，文化属于与国家政府相对的公民社会领域，相应的，文化的创造力必然也来自社会。要想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关键是激发民间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增强社会自身的活力，要激活社会而不是管死社会，管死了社会也就管死了文化。

复旦大学林尚立教授指出：“中国提出社会建设，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其使命是使个人获得生存的保障与发展的可能，使社会获得自我协调、自我管理与自我发展的能力。”他认为，“如果说之前30年的改革使中国走向市场经济、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是通过激发社会个体的活力得以实现的话，那么中国未来30年发展所要完成的社会建设，则必须通过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与能量来实现”。<sup>②</sup>对此笔者深表赞同。对社会组织管理的制度化和规范化，不是为了“管住”它，而是为了充分发挥它在社会建设中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从国家（政府）和社会的关系理解，应该把社会当成建设的对象而不是管理的对象，而建设的手段则是让社会获得自主性，建设的目的是使社会获得创造力。

毋庸讳言，我们所习惯的“管理”思维在很大程度上对社会充满了不信任甚至恐惧，好像社会是一个需要加以严密监控的对象，是不和谐与混乱的根源；似乎社会稳定、社会和谐需要通过严密监管才能获得。其实，社会的真正稳定最终需要的是社会成员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参与，而参与的前提则是创造条件使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

① [美] 约瑟夫·奈：《从“软实力”到“巧实力”》，《南风窗》2009年第13期。

② 林尚立：《社会建设如何突破当前瓶颈》，《文汇报》2009年9月18日。

力来实现这种参与。而且这种参与是多方面的，只是让公民积极参加各种植树活动、爱国卫生运动是不够的，还要让他们名副其实地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由于历史的原因，特别是由于计划体制的遗留，中国社会领域的独立性较低，自组织能力较差。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社会的创新能力。同时，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社会的复杂程度大大提高，国家权力已经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全面控制社会，客观上不可能不出现大量国家权力不及的“灰色”地带。结果，在社会创造力大大降低的同时，大量黑社会现象也随之出现，社会秩序大不如前。因此，在目前情况下，需要在政府引导下进行社会改革，但这个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增强社会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同时通过强化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来优化社会秩序。

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政府不把社会管起来，社会不就乱了吗？特别是在中国，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差，政府不管怎么行？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如上所述，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或自我管理能力是与社会的自治程度、自主程度紧密相关的。没有自主性的社会不可能有自组织能力和自治能力，没有自治能力的社会当然不能自我管理。这就是中国目前的情况：一放（政府退出社会）就乱，一管（政府过多介入社会）就死。乱和死是同一个原因造成的，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母亲总是把孩子抱在怀里不让他自己走路，他就永远也不会走路，因为他没有走路的机会。这个时候如果母亲一下子把他放在地上不管，他当然会跌倒。但须知孩子（社会）站不住（无法自我管理）的根本原因不是他天生没有走路能力（自治能力），而是母亲没有给他走路（自治）的机会。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一方面政府不能一下子撒手不管，另一方面更不应该继续抱着他不放（实际上也抱不住），而是扶他走一段路，最后让孩子自己走路。

如果说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理解，不能简单地把社会当作管理对象，那么，从人和社会的关系来理解，则每个个体都是社会文化创造力的来源，要把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作为社会建设的目的。虽然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条件，包括社会的稳定与和谐；但绝对不能把社会的和谐和稳定与社会活力，也就是每个人的创造力对立起来。

社会活力来自何处？当然是来自每个社会成员的活力，马克思曾经把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当作未来社会，亦即共产主义社会的根本特征，个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目标和归宿。社会主义事业的目的之一，就是为自由个体创造力的发挥创造条件。如果把维护社会稳定与发展个人自由对立起来，认为社会稳定必须建立在扼杀个人自由和个体创造力的基础上，那就违背了社会稳定的根本宗旨。这样的社会稳定不是真正的稳定，而是死水一潭的极权状态，是剥夺了个人自由后的监狱式“稳定”。真正的社会稳定必须创造条件使每个社会成员有更多的机会、更强的能力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创造力，来实现社会参与。

## 二 警惕文化发展中的政府迷思

这就要求我们深入反思计划体制的弊端，重新思考国家和社会的关系。笔者认为计划体制的最大弊端之一就是扼杀了社会自身的创造活力，文化领域也是如此。“文革”时期的文化活动高度计划化，甚至由某些当权者一手包揽，结果整个民族丧失了文化创造力，全民看八个“样板戏”。新时期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就是国家权力逐步、有序地退出社会和文化领域，结果社会的文化创造力得以大大提升。社会的文化活力提高了，文化活动多样了，国家的文化也就繁荣了。社会在文化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是政府无法替代的。但最近几年似乎又出现了文化领域重新计划化的苗头。大量政府主导的文化资产的整合和文化央企的出现，未必都是好事。如果这些文化巨无霸不是通过市场方式自然产生，而是按照计划体制方式人为撮合，如果它的强大所依靠的不是自己的文化创造力和市场竞争力，而是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那么，就可能出现文化领域国富民穷、国进民退的现象，导致央企和民企的两败俱伤。特别是很多地方政府直接主导、介入的大规划大项目，打着“文化发展”“文化强国”的旗号，拿纳税人的钱换来一大堆文化垃圾，倒尽了人们的胃口并滋生了大量腐败现象。

比如，近年来地方政府主导下的拆旧仿古现象席卷全国，在真正的古城古建被无情拆毁的同时，一批新建的“古城”已经或即将涌现出

来。“拆旧”和“仿古”两部大戏同时上演。北大教授吴必虎的统计称，目前全国有不少于30个城市欲斥巨资复建古城，动辄数百亿上千亿的投入往往需要当地百姓世代还债。最新的案例是昆明市晋宁县。2012年10月26日，总投资220亿元的“七彩云南古滇王国文化旅游名城”破土动工，昆明市宣称要用3年时间“再造一个古滇国”。浏览媒体报道，可知类似的“穿越”剧并不少见。山西大同已启动“回到明朝”古城修复工程，河南开封拟斥资千亿重造“汴京盛景”。这些古城、古街的重建多为耗资惊人、占地巨大的政府行为，它们“将一片片历史街区夷为平地，一座座传统民居无情摧毁，然后仿建出一条条复古商业街，不但会造成城市文化空间的破坏、历史文脉的割裂，而且导致城市记忆消失，最终形成千城一面的平庸景致，令人扼腕”，“一些重建项目只是打着与文化相关的旗号，背后是经济利益和政绩工程的驱动，缺乏文化之魂，片面地用浮华形式、简单符号来进行文化建设，最后当然是南辕北辙，拆了真古董造了假古董，沦为笑柄不说，更成为一种政绩泡沫，造成‘政府立项，百姓埋单’的严重后果”。<sup>①</sup>

这些文化工程的弊端多多自不待言，但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政府权力过大，决策过程简单，往往没有充分征求专家和大众意见，领导一拍脑袋即刻上马。我们有些官员有这样的认识误区：政府只要拿出钱来就可以打造文化航母，就可以增强文化软实力、成为文化强国。事实证明这种做法即使主观愿望是好的，结果常常也是事与愿违。

因此，中国目前文化软实力不强、文化创造力不足的现象，不能简单地认为是由于政府对文化管得太少。真正阻碍文化发展的或许正是这种以为政府可以无所不能的迷思。当然，这不是说政府应该什么也不管。关键是管什么和怎么管。在某种意义上说，目前文化创造力不足的原因，不是政府管得太少而是管得太多，不是管得太松而是管得太死，是该管的没有管或管得不好，不该管的又管得太多太死。

这就涉及文化体制改革的问题。举要言之，政府应该提供公共文化

<sup>①</sup> 参见闻白《文化建设需要防止盲目跟风，“古城热”切莫丢了文化魂》，《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9日。